

跨學科的毛澤東研究

——評中兼和津次《毛澤東論：真理從天而降》

● 毛里和子

《毛澤東論：真理從天而降》是第一本用日語寫作的系統、跨學科並具有挑戰性觀點的毛澤東研究專著。作者兼顧了政治學、社會學、思想史等多學科視角，造就這一極具「野心」的研究成果。



中兼和津次：《毛澤東論：真理は天から降ってくる》（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21）。

東京大學經濟學名譽教授中兼和津次的新著《毛澤東論：真理從天而降》（以下簡稱《毛澤東論》，

引用只註頁碼）是第一本用日語寫作的系統、跨學科並具有挑戰性觀點的毛澤東研究專著。中兼和津次是日本屈指可數的中國經濟問題專家，長期從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轉型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對於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尤其在引領日本的中國經濟研究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作為頂尖的經濟學家，作者兼顧了政治學、社會學、思想史等多學科視角，造就這一極具「野心」的研究成果。本書文筆練達、通俗易懂，作為啟蒙書籍可以一口氣讀完；筆者作為書評撰寫者也讀得津津有味，並對現代中國有了很多新的思考。

《毛澤東論》共分十一章（包括「終章」），下文將首先概述全書各章節的主要內容，接着就書中最後一章「應該怎樣評價毛澤東」的內容與作者商榷，然後提出三點引人思考的問題，最後在小結中說明本書相較於其他相關論著的優點。

一 內容介紹

作者在〈前言〉中表明了本書的寫作意圖，即「對他（毛澤東）的行動、政策等問題，用一些符合常理的、而且盡可能合乎邏輯的思考，嘗試進行說明」（頁2），並提出了四個視角：其一，將自詡為「馬克思+秦始皇」的毛澤東視為「馬克思教毛澤東派」的「絕對的教主」；其二，以一種「典型化」和「虛擬化」的視角來探究毛澤東與中國，借用錢理群提出毛澤東的「幽靈」仍漂浮於中國大地的比喻，說明毛澤東主義的影響仍潛藏於現代中國的政治、社會和經濟領域；其三，假設在中國和蘇聯，被稱為「科學社會主義」的馬克思學說是絕對真理和歷史法則，並已衍生出宗教教義與暴力機制；其四，假設毛澤東的思想「一方面源自秦始皇的專制集權、強權統治，另一方面受到對暴力有所肯定的意識形態、即馬克思的暴力革命論的影響」（頁6），是兩者相結合的產物。

在第一章「毛澤東的哲學和思想」中，作者從「矛盾論」、「實踐論」切入，剖析作為思想家的毛澤東，指出毛澤東的思想在哲學邏輯上存在以下「重大陷阱」：其一，「實踐論」只從實踐中尋求「真理」的標準，導致經常極端地將一個問題歸結於單一主因，不能解釋複雜的社會現象；其二，實踐過程中由誰來判斷「正確與否」是不確定的；其三，「矛盾論」強調實踐時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這一過程的無限重複，惡意的感性在同一邏輯下容易

轉化為性質惡劣的行動；其四，「矛盾論」沒有說清楚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往復轉化的邏輯是甚麼，實踐時總是出現「認識的突然的變化、飛躍」（頁29）。但是，如作者引述李銳所言，毛澤東自己卻抱有「家父長思想」的很強的自負（頁35、377），使毛澤東思想實際上轉化成不容質疑的宗教教義：「在毛澤東時代，有言『信者得救』。相反，就變成『懷疑者下地獄』。」（頁36）

第二章「毛澤東與魯迅」中，作者比較了梁漱溟與毛澤東、胡風與毛澤東、魯迅與毛澤東這三組人物的交往事跡，帶出文藝與政治的微妙關係，內容精彩而有趣。其中，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關係尤為耐人尋味，梁漱溟脫胎自儒學的溫和的土地改革主張，不為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改造」政策所包容，前者甚至屢被批判為野心家、偽君子、惡意的反動思想家等。本章的核心問題是翻譯家羅稷南向毛澤東提到

作者以一種「典型化」和「虛擬化」的視角來探究毛澤東與中國，借用錢理群提出毛澤東的「幽靈」仍漂浮於中國大地的比喻，說明毛澤東主義的影響仍潛藏於現代中國的政治、社會和經濟領域。



中兼和津次是日本屈指可數的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圖片由中兼和津次提供）

本書描寫了以1959年廬山會議為高潮的毛澤東和彭德懷的激烈衝突，並將雙方的對峙追溯至1930至40年代，其中有許多新見解。作者認為彭德懷下台的大背景是以意識形態形式化和權力目的化為表現的黨的變質。

「如果今天魯迅還活着會怎樣？」這一問題（頁38-39）^①。作者敏銳地設想：「毛澤東是否在直面一個可能性，即魯迅的筆之矛頭也許會指向自己，甚或刺穿自身。」（頁66）

第三章「階級鬥爭論與群眾路線」中，作者論證了這樣一個觀點：馬克思主義對毛澤東來說只是工具而不是思想。作者認為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隨自己意願加以解釋，革命時期將之用於解放和奪取權力，建國後又將之用於維護和擴大權力。毛澤東在分析階級時，認為階級與所有制之間沒有對應關係，其劃分階級的重點在於為了明確敵友，因此建國以後毛澤東的階級論按時勢發生了多次變化。此外，作者還認為毛澤東推行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論「繼續革命論」，與建國後眾多政治運動一樣，是在斯大林強調嚴打「階級敵人」的極端主張的影響下產生的（頁84）。

需要說明的是，本書是以毛澤東掌握着整個政治進程的前提下展開討論的，而這一前提與事實相符嗎？奧克森伯格 (Michel Oksenberg) 認為毛澤東在政治中的作用是多種多樣的，包括對政治運動的倡議、確定優先順序、保證運動的前後連貫性，以及對既定方針政策的歪曲、修正與介入，等等。比如，毛澤東發動中國農業集體化運動、大躍進等都是既定方針的大轉變，而「歪曲」得最嚴重的就是以北京奪權為開端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的恣意介入導致時局的動盪和大混亂，而在脫離了其全面領導的1956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顯然毛澤東是「偷懶了」，對反對急躁冒

進等倡議不置可否。特別是在中共八大之後，毛澤東公然「歪曲」、介入已經達成的協議、既定的路線，發動了反右派鬥爭^②。

本書在第四章「反右派鬥爭的發展和結局」中對反右派鬥爭及其後發生的各種事變的評價基本與學術界的通說相近。作者認為把毛澤東推向反右派鬥爭的原因是蘇聯對斯大林的批判、東歐國家的反蘇暴動、國內民主人士對中共的猛烈批判；作者並沒有主張所謂的「陽謀說」，即認為毛澤東的一系列舉動是為了「引蛇出洞」^③。

第五章「大躍進和大饑荒」中，作者利用李銳回憶錄《「大躍進」親歷記》、《廬山會議真面目》，沈志華的《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闡述從反右派鬥爭到大躍進的發展過程，並對曹樹基的〈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等論著進行了探討^④，支持曹文中基於地方志比較所得出的數字計算結果：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非正常死亡」的有3,245.8萬人。另外，曹文通過比較太平天國時期和大躍進時期的死亡人數，揭露了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兩大傷亡慘重的天災人禍的殘酷事實，也受到作者關注（頁170-72）。

第六章「彭德懷的悲劇」中描寫了以1959年廬山會議為高潮的毛澤東和彭德懷的激烈衝突，並將雙方的對峙追溯至1930至40年代；其中有許多新見解，令人讀之興趣盎然。例如談到1937年洛川會議中彭德懷對毛澤東有所批評，導致兩人關係惡化；指出毛澤東強烈的

自尊心與彭德懷固執、傲慢的性格屢生衝突，加上彭德懷在軍中的威信引起毛澤東猜疑，令其對彭德懷的反抗難以接受。書中提到毛澤東對彭德懷進行批判的態度十分執拗，誰也無法阻止。因此，作者認為彭德懷下台的大背景是以意識形態形式化和權力目的化為表現的黨的變質。

作者在第七章「毛澤東的政治經濟學」中以1974年出版的《毛澤東談政治經濟學：「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筆記》一書的文獻資料為素材^⑤，對毛澤東的「矛盾經濟學」進行剖析（頁246）。這個領域的問題研究是作者最胸有成竹的部分，因此在立論方面充滿信心。毛澤東的經濟思想概括而言，是「上層建築變革→所有制變革→生產力發展」，是「與一般意義上的唯物史觀完全相反的邏輯」，「這種邏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頁225）。毛澤東雖然執著於追求「大同思想」等「精神刺激」、人民公社和地方分權，但在擺脫斯大林、蘇聯制約之後，也有重視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三者之間的平衡，以及重視傳統技術和中小企業的一面。毛澤東經濟思想的最大缺陷在於沒有「各種制度和生產要素間合作的經濟學視角」，在行政分權的同時不但未有履行市場分權，而且無視市場經濟的「價值法則」和「供給調節機制」，導致市場的「無秩序、無計劃」（頁247-50）。

第八章「文化大革命與毛澤東」是本書的核心部分，作者在此提出的觀點是：文革的潛伏期與助跑期應當從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開

始，實乃真知灼見——會議中劉少奇對「三面紅旗」方針的異議，與林彪對毛澤東的讚美以及毛澤東只認同大躍進的失敗源於錯判經濟條件，形成鮮明對比。作者認為文革是直接的權力鬥爭、間接的理念之爭，並指出這一評價及對文革的敘述內容大體與學界此前研究相似，包括《毛澤東秘錄》、《周恩來秘錄：談黨機密文書》、《毛澤東最後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等^⑥。書中還引用了曾經歷天津文革的南開大學退休教授王輝的觀點，認為文革就是「奴隸主義、封建專制主義以及所謂的社會主義聚集一堂」，與「中國傳統文化不斷累積的歷史包袱」的「混合物」，呈現出文革令人遺憾和窒息的一面（頁293）。筆者期待作者創新地解析文革中最具爭議性的事件——林彪事件，但閱讀本章後並沒有發現甚麼新見解。作者認為，林彪事件是專制獨裁者的權力欲和猜疑心所導致注定沒有接班人的悲劇（頁290-92）。

第九章「毛澤東與周恩來」中，作者首先從1932年的寧都會議開始敘述毛澤東、周恩來的關係，描寫毛澤東在1935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上掌握了黨的大權，此後直到毛澤東去世，周恩來都一直處於前者的統治之下。《周恩來秘錄》是作者在論述本章內容時的重要依據，並直接引述該書觀點：「延安整風以後，無論周是否意識到，他都開始凡事以君臣之道處理與毛澤東的關係，竭力向毛澤東效命。」（頁303）這似乎是中國學術界對周恩來評價的定論，如本章引

「文化大革命與毛澤東」是本書的核心部分，作者在此提出的觀點是：文革的潛伏期與助跑期應當從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開始，認為文革是直接的權力鬥爭、間接的理念之爭。

作者的本意似乎是，如果把馬克思主義以及派生出來的列寧主義和毛澤東主義視為宗教而非科學，就可以很好地解釋社會主義革命、建國後的各種運動和歷史事件。可是，將毛澤東主義視為宗教就真能解釋毛澤東時代中國的一切嗎？

述司馬清揚、歐陽龍門的《新發現的周恩來》，王輝的《文化大革命的真實：天津大動亂》，肖特(Philip Short)的《毛澤東：人生》(*Mao: A Life*)都有類似觀點^⑦。但是，如作者所言，要想真正理解兩人之間支配與從屬、「理想形象」和「骯髒現實」的複雜關係，是極度不容易的，需要作更深入的研究分析(頁331)。

第十章「毛澤東周圍的諸位女性」的內容主要圍繞楊開慧、賀子珍、江青、張玉鳳四位女性展開。書中這樣描述毛澤東的女性觀：「把女性當作是手段，更難聽一點就是道具」，例如將女性從家事中釋出，讓其從事人民公社內公共食堂的炊食，並不是真正的女性解放(頁346)。筆者認為本章的內容集中講述毛澤東的私人生活，與本書的高度學術性不太相符，而且毛澤東與四位女性的交往也與其提倡的婦女政策不太相關。

二 應該怎樣評價毛澤東

本書「終章」為「應該怎樣評價毛澤東」，概括了作者極為大膽地推斷的「毛澤東論」。作者指出，毛澤東思想有如為了實現「普遍的真理」而展開的「世俗宗教」，並把對修正主義者的攻擊視為「對信徒的指導」，使社會無法形成制約，在追隨「真理」的同時產生大量人禍。毛澤東思想在權力主義、實用主義、精英主義之間往復，成為現代中國基本的統治原理，而且三者的

互相補充使權力主義得以持續強化。作者認為毛澤東留給現代中國的是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地方分權化的政治框架、犧牲良多換來的工農業技術基礎以及基礎教育和醫療的普及。是非功過，留待後人評說。在本章中作者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展現，特別推薦讀者閱讀。

作者認為，馬克思主義(不是毛澤東主義)以及馬克思以後的所有社會主義的總體思想，是「應該是這樣」式的想當然的論斷，只是一種空想，並未把階級與私有制聯繫起來看待，而單純地將社會糾紛視作「有權集團」和「無權集團」的利益之爭。其中德國思想家達倫多夫(Ralf G. Dahrendorf)的解釋具有一定說服力——他認為現代階級衝突的根源不是佔有和未佔有生產資料之間的矛盾，而是權威的分享和排斥之間的矛盾。作者還引用了蘇聯末期的諷喻話語，比如「唯物史觀並不是甚麼普遍的真理，只是一種假說」，「社會主義不就是從資本主義到資本主義的漫長過渡期嗎？」(頁350-52)作者在書中的最後部分，提到近代資本主義是市場、法律、民主緊密結合並以市場為軸心形成的宏大體系，以對應容易走向專制和忽視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頁376)，筆者認為這一有如「資本主義贊歌」般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坦率地說，把馬克思主義等社會主義學說都全部歸結為百分百的假說和空想是不恰當的。近年來，年輕學者齋藤幸平的研究引起了筆者的關注。齋藤嘗試從馬克思

未出版的筆記中重新梳理馬克思晚年的思想，並認為其中構想了一種脫離生產力至上主義、進步史觀、歷史唯物論的「去增長共產主義」，展示了社會主義的靈活性和現實關懷^⑧。當然，這已經超出本文所要探討的範圍，在此不深入展開。

此外，令筆者感到驚訝的是，作者的本意似乎是，如果把馬克思主義以及從馬克思主義派生出來的列寧主義和毛澤東主義視為宗教而非科學，就可以很好地解釋社會主義革命、建國後的各種運動和歷史事件。可是，將毛澤東主義視為宗教就真能解釋毛澤東時代中國的一切嗎？這樣的解釋能對中國研究有所促進和補充嗎？把中國這一系列客觀事實簡單用宗教進行解釋，研究者自身會不會陷入教條化或者知識懶惰的陷阱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說法將馬克思主義等社會主義學說一概而論，但筆者認為把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主義區分開來是必要的。闡明毛澤東時代中國整體的特性，不是才能促使研究走向新起點嗎？

確實，考察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以及毛澤東和民眾間的關係，很容易被拉進宗教的世界。如後文所述，筆者愈了解毛澤東時代的「陰暗」部分，就愈覺得當時和太平天國相似，兩者在宗教性和民粹主義方面有很多共同點。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以空想甚至宗教來說明毛澤東時代和現代中國的一切事物與現象，更談不上有所總結。筆者並打算把毛澤東置於宗教世界中進行

說明，而是想從實際情況來把握毛澤東時代的中國。

三 對本書的三點思考

本書最大的貢獻是給研究者以敏銳的知識啟迪。筆者從本書中受到正反兩方面的強烈刺激，並對現代中國研究產生新思考，發現新問題。

(一) 太平天國和共產「王朝」

本書沒有從「與傳統的關係」角度來論述毛澤東，但毛澤東一生最關心的無疑是中國的傳統、農民起義和革命的關係。作為傳統主義者的毛澤東小時候不喜歡四書五經、三字經等經史子集，而是沉迷於《水滸傳》、《三國演義》等小說的故事之中^⑨。

太平天國雖只有短短十幾年的歷史，但毛澤東對太平天國的歷史十分感興趣，並將之視為前車之鑒，認為錯誤的鬥爭手段、洪秀全和楊秀清的兩頭政治、腐敗問題等導致太平天國的失敗，又高度評價太平天國的「均產主義」^⑩。洪秀全和毛澤東有很多共同點，都面臨領導集團內部鬥爭、兩個「國家」的權力結構等局面與難題。太平天國時期(1851-1864)和中國共產革命時期(1921-1976)之間共同點也很多，比如對宗教教義的虔誠(前者是對基督教，後者用作者的說法是對「馬克思教毛澤東派」、象徵平等主義和均產主義的天朝田

太平天國時期和中國共產革命時期之間共同點很多，比如對宗教教義的虔誠、象徵平等主義和均產主義的天朝田畝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等。太平天國大概是毛澤東的參考模型。

直到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之前，中蘇關係正處於蜜月期，毛澤東對斯大林既崇拜又敬畏。之後毛澤東的態度卻大變，要脫離斯大林、擺脫蘇聯，毛澤東到底經歷了怎樣的思想轉變？

畝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等等。太平天國大概是毛澤東的參考模型，例如朱毛紅軍創立時本來是打算以太平天國軍和黃埔軍校為模範的，但由於前者信息不足，最終還是學習「黃埔模式」為主^⑩。

菊池秀明在《太平天國——沒有皇帝的中國的挫折》中分析了中國近現代專制統治者（洪秀全、楊秀清、袁世凱、孫中山、毛澤東）的特性，指出他們因為沒有得到最終的結果（「成為皇帝」）而感到不安，進而尋求更大的權力，並由此導致了用壓迫和暴力進行統治等一系列手段^⑪。換言之，用暴力奪權的領袖遲早會遭受被他人篡權的恐懼所折磨，從而走向專制政治。

（二）斯大林和毛澤東

筆者以為，分析毛澤東時不能忽略的是，直到1950年代中期，毛澤東判斷事物的參考標準都是蘇聯和斯大林。1953年以前，毛澤東對斯大林一直懷有強烈的敬畏，是一個順從的斯大林主義者。蘇共和中共自1947年開始可以直接用電報通信，自此兩黨建立的聯繫更為密切。本書就毛澤東對蘇關係的情況只是略有涉及，並分散在不同章節中（頁41、76、83、234、244），但蘇聯、斯大林、冷戰環境以及後來的中蘇對立對毛澤東的影響，更加需要重視。隨着蘇聯解體，很多與前蘇聯有關的文件、檔案被公開，流散各地，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沈志華為代表的許多國際學術界學者熱心收集

起來。從這些文件、檔案中可以看出，蘇聯政府和斯大林為中國政府的建立、國家制度的規劃、計劃經濟的完善和工業化進程的開展付出了大量精力^⑫。

毛澤東曾於中共建國前強烈要求到莫斯科參訪，但斯大林以旅途危險為由，建議他建國後再安排訪問，並於1949年1月將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Anastas I. Mikoyan）派往中共根據地，作為替代方案。在十天的訪問中，米高揚與毛澤東進行了七次會談，在會見中共全體領導人的同時，就新中國的國家結構、經濟援助、五年計劃等問題進行細緻的協商。毛澤東、米高揚還討論了新疆、內外蒙古合併等敏感問題^⑬。重視會談的斯大林連夜召開蘇共政治局會議，並隨時與米高揚保持聯繫^⑭。

6月底至8月劉少奇一行訪蘇。對於建立新中國的國家構想，劉少奇做了詳細的報告。斯大林基本上以新民主主義、聯合政權的構想來回應，還就之前蘇聯對中共領導的不恰當態度表示歉意，並提出了「今後的革命運動，西方由蘇聯領導，東方由中國領導」等提案，對新中國的發展表示了極大的關切^⑮。

12月16日，毛澤東與憧憬多時的斯大林會面，他非常緊張、怯怯地提出對東亞局勢的擔心，而斯大林則是悠然地回應，兩者態度的對比很有意思^⑯：

毛澤東：新中國最大的問題是確保和平。為了使中國的經濟恢復到戰前的水平，穩定國內，無論如

何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斯大林同志，怎樣才能維持國際和平呢？

斯大林：就中國而言，目前還沒有甚麼威脅，因為日本還未自立，美國也害怕戰爭。沒人想和中國開戰。難道金日成會想要進攻中國？只要維持友好，保住和平，別說五至十年，二十至二十五年甚至更久也可以……

1950年2月，斯大林和毛澤東、周恩來分別代表蘇聯和中國，締結了對抗美日的同盟條約，建立了圍繞新疆和東北的中蘇特殊關係。1952年周恩來訪蘇，1956年李富春副總理訪蘇，兩次同蘇聯政府細緻商定五年計劃。直到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之前，中蘇關係正處於蜜月期，毛澤東對斯大林既崇拜又敬畏。之後毛澤東的態度卻大變，要脫離斯大林、擺脫蘇聯，這三年裏，毛澤東到底經歷了怎樣的思想轉變？

(三) 革命、暴力和政治性處決

如前所述，作者認為毛澤東時代的執政總有幾分暴力與恐怖的色彩，是因為受到《共產黨宣言》中暴力革命思想和以秦始皇為代表的傳統「強權統治」思想的影響。讀畢本書，筆者重新認識了現代中國的第三個要點——在新中國誕生、建立、治理的背後有着流了大量鮮血的殘酷現實。除了本書提及大躍進的失敗造成3,200多萬人的「非正常死亡」，在1950年代初的

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有70多萬人被處決，在反右派鬥爭中被劃定為右派和中右派的共450萬人被批鬥、撤職；更遑論文革導致的「非正常死亡」，有說172萬人，也有說212萬人以上¹⁹。

近年來，有歷史學者開始探討毛澤東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採用設定處決人數的方式，而這成為後來政治運動的典範，在鎮壓反革命時的目標數值是每千人中有一人是「反革命」²⁰。相對於以建國和建設為主線的光明歷史，對於這種「政治性處決」的陰暗歷史，今後的歷史學家將會如何論斷、如何講述？

四 小結

研究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絕不是輕鬆愉快的事情，閱讀本書就像打開了「潘多拉魔盒」。相較於其他相關論著而言，本書具有以下五個優點：

第一，在文獻運用方面，令人佩服的是作者所用文獻之繁多、選擇之準確、解讀之精到。當事人的回憶錄如薄一波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²¹、李銳的《「大躍進」親歷記》；後學的研究成果如嚴家其和高皋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產經新聞「毛澤東秘錄」取材班的《毛澤東秘錄》、高文謙的《周恩來秘錄》，等等，為本書的論述打下了堅實的史料基礎。

第二，與此同時，本書運用了多部不同時期出版的記錄了毛澤東著作、講話內容的原典作品。其

在新中國誕生、建立、治理的背後有着流了大量鮮血的殘酷現實。相對於以建國和建設為主線的光明歷史，對於「政治性處決」的陰暗歷史，今後的歷史學家將會如何講述？

作者在本書「終章」中非常大膽地推斷了想要闡述的「毛澤東論」，指出毛澤東思想有如為了實現「普遍的真理」而展開的「世俗宗教」，觀點鮮明，是本書重要的特點。

中，最為重要的文獻是竹內實主編的日文版《毛澤東集》^②。此外，作者還參考了矢吹晉翻譯的《毛澤東談政治經濟學》等已翻譯成日語的史料（〈參考文獻〉，頁19-21）。

第三，在筆者看來，第二章中對梁漱溟、胡風、魯迅與毛澤東之間的三組人物關係的比較分析特別具有吸引力，可能因為人物的選擇與組合較為巧妙。最值得一提的則是，第七章闡釋毛澤東的政治經濟學，作者進行了扎實而可信的理論考察，內容極具說服力。

第四，作者雖以經濟學研究著稱，但在本書中，作者兼顧了政治學、社會學、思想史等多學科的視角，做出了成功的跨學科研究成果。

第五，作者在本書「終章」中非常大膽地推斷了想要闡述的「毛澤東論」，指出毛澤東思想有如為了實現「普遍的真理」而展開的「世俗宗教」，觀點鮮明，也是本書重要的特點。

譚暢、徐顯芬 譯

註釋

① 譯者註：魯迅之子周海嬰出版的回憶錄《魯迅與我七十年》中，出現了一段至今爭議紛紛、無法確定是否發生的傳聞：1957年夏，毛澤東曾經前往上海參加座談會，其中著名翻譯家羅稷南趁着閒暇時光，向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假設性問題：「要是今天魯迅還活着，他可能會怎樣？」面對這個大膽的提問，毛澤東認真沉思片刻，回答說：「根據我的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裏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參

見周海嬰：〈再說幾句〉，載《魯迅與我七十年》（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1），頁370-71。

② Michel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under Mao: 1949-1968", in *China: Management of a Revolutionary Society*, ed. John M. H. Lindbeck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1), 102-15.

③ 本書未有考據反右派鬥爭中被列為右派份子的人數。2013年一篇文章引述了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反右派鬥爭的統計：劃定右派份子3,178,470人、中右份子1,437,562人。參見羅冰：〈1957年的那件事解密了〉（2013年1月3日），<http://msss.ust.hk/forum/showthread.php?tid=11926>。

④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廬山會議真面目》（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曹樹基：〈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國人口科學》，2005年第1期，頁16-30、97。

⑤ 毛澤東著，矢吹晉譯：《政治經濟學を語る：ソ連政治經濟學讀書ノート》（東京：現代評論社，1974）。

⑥ 產經新聞「毛澤東秘錄」取材班：《毛澤東秘錄》（東京：產經新聞社，1999）；高文謙著，上村幸治譯：《周恩來秘錄：黨機密文書は語る》（東京：文藝春秋，2007）。譯者註：該書可能譯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ロデリック・マクファーラー（Roderick MacFarquhar）、マイケル・シェーンハルス（Michael Schoenhals）著，朝倉和子譯：《毛澤東最後の革命》（東京：青燈社，2010）；嚴家祺、高皋著，辻康吾譯：《文

化大革命十年史》(東京：岩波書局，1996)。

⑦ 司馬清揚、歐陽龍門：《新發現的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9)；王輝著，中路陽子譯：《文化大革命的真實：天津大動亂》(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3)；フィリップ・ショート(Philip Short)著，山形浩生、守岡櫻譯：《毛澤東 ある人生》(東京：白水社，2010)。

⑧ 齋藤幸平：《人新世の「資本論」》(東京：集英社，2020)，特別參見第七章「脱成長コミュニティが世界を救う」的論述，頁277-325。

⑨ 王阿壽：〈小故事影響大人物——中國古今社會傳奇對毛澤東的影響〉，《黨史文苑》，2008年第17期，頁4-6。

⑩ 金實秋：〈孫中山和毛澤東論太平天國〉，《光明日報》，2005年4月5日，第7版。

⑪ 葉福林：〈中央曾設想以「太平軍編制」改編朱毛行軍〉，《黨史博採》，2014年第2期，頁40-41。

⑫ 菊池秀明：《太平天國——皇帝なき中國の挫折》(東京：岩波書店，2020)，頁233。

⑬ 比如，本書編委會編：《中國與蘇聯關係文獻彙編(1949年10月—1951年12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中國與蘇聯關係文獻彙編(1952年—1955年)》編委會編：《中國與蘇聯關係文獻彙編(1952年—1955年)》(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5)。

⑭ 譯者註：列多夫斯基(Andrei M. Ledovsky)著，李玉貞譯：〈米高揚與毛澤東的秘密談判(1949年1-2月)〉(上、中、下)，《黨的文獻》，1995年第6期，頁81-84、1996年第1期，頁90-96、1996年第3期，頁77-83。

⑮ 沈志華：〈從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澤東宣布向蘇聯「一邊倒」——關於中蘇同盟建立之背

景和基礎的再討論(之二)〉，《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4期，頁15-19。

⑯ 金牛：〈劉少奇秘訪克里姆林宮——來自俄國檔案的秘密〉，《百年潮》，1997年第5期，頁57-64；沈志華：〈毛澤東與東方情報局〉，《同舟共進》，2012年第1期，頁35；〈同斯大林談推翻國民黨問題〉(1949年7月27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頁35-36等。

⑰ “Record of Conversation, Stalin and Mao Zedong” (16 December 1949), in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ed. Odd A. Westad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314.

⑱ 〈葉劍英の1982年9月演説〉，載楊繼繩著，辻康吾編，現代中國資料研究會譯：《文化大革命五十年》(東京：岩波書店，2019)，頁225-26；徐有漁著，及川淳子譯：〈文革とは何か〉，載明治大學現代中國研究所、石井知章、鈴木賢編：《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の現代的地平》(東京：白水社，2017)，頁30。

⑲ 左慈：〈試析鎮壓反革命運動中的處決比例問題〉，《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20年4月號，頁55-69。

⑳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下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1993)。

㉑ 竹內實主編：《毛澤東集》，第一至十卷(東京：北望社，1970-1972)。